



教育学文丛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与教育制度安排

——一种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视角

Jiaoyu Ziyuan Liyong Xiaolü
Yu Jiaoyu Zhidu Anpai

教育成本不仅仅体现在人才培养投入过程中，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伴随的大量的教育资源无效利用乃至浪费形成的交易费用同样是教育成本的重要构成。

杨秀芹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uasha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教育学文丛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与教育制度安排

——一种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视角

Jiaoyu Ziyuan Liyong Xiaolü
Yu Jiaoyu Zhidu Anpai

杨秀芹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与教育制度安排——一种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视角/杨秀芹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622-3860-7

I. 教… II. 杨… III. 教育—资源利用—研究 IV. G40-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107 号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与教育制度安排

——一种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视角

◎ 杨秀芹 著

责任编辑:谢 琴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甘 英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 027-67867371 027-67861549

传真:027-67863291

邮购:027-67861321

网址: <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52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

版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2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027)67861321

序

杨秀芹博士的学术专著《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与教育制度安排》即将出版，我感到十分欣慰，并表示由衷的祝贺！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是一个亘古尤新的话题，尤其在教育资源稀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更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而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制度变迁研究也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向教育领域的渗透产生的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作者凭借其学术研究的敏感性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在教育制度安排尤其是在教育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来探讨教育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也使得本书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本书主要分析在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而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带来的影响及损失，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在国内，从教育制度安排和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教育资源利用效率问题的著作尚不多见。尽管现时有关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研究的著作很多，但是大多是从实证的角度或者是从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去探讨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问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与教育制度安排》则是一部系统研究在教育制度安排过程中有关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相关问题的论著，因而在以下两个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

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该书从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层面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中，“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因此，教育制度在文中被界定为教育领域的一种规则，教育制度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制度约束，不仅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测性，弥补个人理性之不足，而且可以在保证自然而有

秩序地实现个人最大化教育行为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比较有效的教育利益约束和教育行为规范，从而在个人教育利益与公共教育利益之间形成均衡的交互，以期增进公共教育利益。

二是理论观点的创新。该书建立了教育制度效度与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教育制度的供给越有效，对于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大，而如果教育制度存在缺失或者缺陷，那么就意味着会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带来消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教育制度缺失或者低效会带来教育行为的失范或行为的越轨，一些投机主义倾向便会泛滥，他们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者金钱来进行“设租”和“寻租”。同时，教育制度变迁关系到多方面的利益调整和再分配，每次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都会带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构成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阻碍力和摩擦力，这些都属于教育资源的内耗，并不会产生生产价值，实际上增加了教育内部的交易费用，因而对于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也就是消极的。

长久以来，我们试图回避教育制度变迁这一经济色彩比较浓的话题，殊不知我们一直主张的教育改革、教育创新等都没有逃脱出教育制度变迁的范畴。教育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该书选取其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为切入点，而这种影响是以利益的损失和教育资源的损耗为表征，直观但不具体，因为低效率并非发生在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此，该书的意义在于为教育实践敲响警钟并希望为深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贡献一份力量。

我相信，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教学、科研的教育工作者、广大教师和研究生花点时间读读这本书，一定会从中汲取不少新的观点、新的素材，得到新的启示。

尽管该书颇具新意，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证分析方面，仍有许多工作有待作者进一步去努力，希望作者能以本书为起点，脚踏实地，继续深入研究，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范先佐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一、研究的缘起	(1)
二、研究的现状	(4)
三、研究的方法	(27)
四、研究的意义	(30)
五、研究的基本思路与逻辑结构	(35)
第二章 制度与效率：概念的界定	(40)
一、制度与教育制度	(41)
二、效率与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67)
第三章 交易费用与教育制度：研究脉络的厘清	(81)
一、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假设	(81)
二、研究的理论渊源	(91)
三、交易费用与教育制度的选择与变迁	(100)
四、教育制度、交易费用及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经济逻辑	(120)
第四章 教育制度缺失引致的资源利用低效率	(124)
一、制度的缺失与教育制度缺失	(124)
二、教育制度缺失引致的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	(134)
第五章 教育制度低效引致的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	(156)
一、教育制度低效的原因	(157)
二、教育制度低效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168)
三、教育制度低效语境下的高等学校博弈行为引致的利益损失	(176)

四、教育制度低效语境下的高等学校委托代理关系引致的利益损失·····	(187)
第六章 教育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冲突引致的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	(193)
一、教育制度变迁：历史的必然与现实的足迹·····	(193)
二、我国教育制度变迁现状·····	(205)
三、教育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冲突引致的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	(212)
第七章 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与教育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231)
一、教育制度缺失与弥补路径选择·····	(231)
二、教育制度低效与教育制度创新·····	(242)
三、教育制度变迁中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	(255)
结 语·····	(265)
主要参考文献·····	(268)
后 记·····	(283)

第一章 导 言

长期以来，人们视教育为消费和福利，认为教育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同时，由于教育组织是非营利机构，因而既没有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动力，也没有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外在压力。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由政府举办，教育投资由政府财政拨款，教育产出的数量、结构、质量均由政府教育计划确定，教育机构没有决策权，也没有自身利益。高等学校等教育组织也只关心增加投入，不关心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种体制虽然变了，但是教育投入一直不足，加上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处于落后状态，亟待发展。而在教育上我国却是教育大国，适龄受教育人口众多，不发达的经济很难支撑高等教育需求，导致了我国教育资源短缺现象严重。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入学人数的增多使原本就不充裕的教育经费显得更加紧张，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投入。而政府投入的乏力也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理性审视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不仅有利于正确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也有利于顺利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认识也会有所裨益。

一、研究的缘起

教育资源是以人力、物力为表现形态的物质存在，它相对于学生及其家庭对教育的期望而言永远是稀缺的，也正是因为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才使本书确定了研究起点。一

般来讲,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有两层含义^①:一是指作为资源的教育本身是稀缺的,如学校数量的有限性难以满足人们上学接受教育的需要,高等教育规模的有限性把许多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青年挡在高等学校大门之外,等等;二是指使教育得以进行的各种社会资源的稀缺,直接的表现是教育经费的短缺以及保证教育活动有效运作的制度安排的缺失。这两者又有着必然的联系,教育经费的短缺必然导致教育供给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不能满足日益旺盛的教育需求,影响着择校、收费等一系列教育政策和教育行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源稀缺有着特殊的表现,是一种教育供给严重不足与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并存的尴尬境域。

一方面,教育供给严重不足,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八五”期间持续下滑,1995 年滑到谷底,只有 2.41%。“九五”期间缓慢爬升,2000 年达到 2.87%,每年增长不到 0.1 个百分点。“十五”开局很好,第一年就达到 3.14%,突破了 3% 的大关。2002 年达到 3.32%,增加了 0.18 个百分点。但是,2003 年下降为 3.28%,2004 年下降到 2.79%,只相当于 1999 年的水平,到 2005 年又开始回升到 3.41%。1993 年,中共中央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 4% 的目标至今仍未能实现,尤其是近几年,我国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之后,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开始备受关注。

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利用率低下,资源浪费的现象也比较严重,致使有限的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李福华博士对全国 1000 余所普通高校的人力、财力等资源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我国高等学校财力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均费用指数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学校规模扩大后并未充分形成规模效益;生师比(较低)比起其

^① 马健生、石英姿:《论教育改革活动的环境特性》,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

他国家来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刘亚荣博士通过 DEA (数据包络分析)^① 方法对我国 257 所工科院校进行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其中有 83 所学校属于 DEA 不有效,占总数的 32.3%,有相当的投入指标数值的富余程度比较严重。另外,从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中也可以略见一斑,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生均经费指数世界平均水平保持在 0.50 左右,而相同时期我国的生均经费指数从 1980 年的 3.62 下降到 1991 年的 1.93,相当于平均水平的近 4 倍,直至 2004 年,我国的生均经费指数基本保持在 1.50 左右,而我国高等院校的规模较之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普遍有了较大的扩张,理论上业已证明的规模效益关系没有体现出来,说明我国高等院校的资源利用低效率现象比较普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汉纳谢克 (Hanushek) 曾就投入教育过程的要素的配置优化对教育结果的影响作过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学校用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典型投入政策(例如降低班级规模、聘用具有更多教学经验和更高学历的教师、提高教师工资以及提高生均费用)并没有显示出与学生学业成就具有一致性的关系^②。汉纳谢克的结论实际上是表述这样一个存在:一味地增加投入对教育产出产生的作用并没有理想中的大,这也实际上验证了提高学校内部资源利用

① 数据包络分析简称 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它是运筹学分支,用于研究多输入多输出的生产函数理论时,不需要预先估计参数,另外在避免主观因素和简化算法、减少误差等方面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优越性,特别适用于公共事业的评价。DEA 以数学上严密的定理形式,证明与经济学的 pareto 有效性等价,并显示出比生产函数更加优越的性能。DEA 通过设立的线性规划模型,得出的是相对有效的方法。这个相对有效比绝对有效更具实际意义,因为对一个系统,大量的管理运筹学的实际应用研究已经说明,任何生产效率都不可能达到最优,实际的生产只能追求适合本系统中的生产状况的“满意”效率。

② [美] Martin Carnoy 编著:《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因维方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1 页。

效率与教育产出有较强的关联程度，换言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产出的影响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

我们一般从两个方面来衡量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其一是非配置效率，即生产效率，反映教育资源在教育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利用程度；其二是配置效率，反映作为稀缺的教育资源是否合理配置从而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我国目前的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问题则兼而有之，既存在总量性教育资源短缺，又存在制度性和结构性教育资源短缺。总量性短缺是伴随社会和教育发展最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方面，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可利用资源来保障教育的发展；而结构性短缺则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只有通过制度完善及市场、政府的调节、调控，使可利用的教育资源提高利用效率，才能够缓解这种结构性的教育资源短缺。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其一要降低教育成本，其二要扩大教育产出。降低教育成本，能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以及经济困难家庭教育投入的压力，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扩大教育产出，使学生获取等量知识的能力增强，相对缩短了受教育年限，同样达到了降低教育成本的功效。这样才能促进各类教育的迅速普及和发展。虽然有很多的研究支持了高等教育经费的多元筹措方式，但是在我们看来对于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似乎更符合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不仅仅是“量的增减”，更重要的是“结构的重构”，因此我们认为教育经济研究重心也应该转到“质”的方面来，进行制度和结构的分析。因此，如何在现有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利用潜力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从研究的角度上，本书把重点放在制度安排过程中导致的结构性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上，探究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使学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二、研究的现状

效率的研究是一个古老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领

域。资源的稀缺是一个客观现实，正因为此，效率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学对于效率的研究由来已久，文献分析表明，从马克思主义的效率观，到新古典经济学对于效率的解释，到X（低）效率^①理论对于效率研究的拓展，再到新制度经济学以崭新的视角来研究效率，可以说效率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而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在不断地拓宽和更新。而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伴随着教育经济学科的不断发展壮大从未停止过，研究者对长期困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问题进行了诸多的研究，涉及教育资源利用的外部效率和内部效率等，研究的结果都有近乎相同的指向：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不但存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存在所投入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效率观

马克思对于效率的解释是从商品开始的，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有二重性^②，也就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劳动生产能力的大小一般用劳动生产率表示。在马克思著作中这两个概念经常相互通用，认为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者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效率，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表示，也可以用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①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②科技发展水平越高，科技越是与生产过程结合紧密，就越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③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的对劳动生产率同样会有促进或者抑制的影响。④生产资料的数量越充分、质量越

① “X”代表造成非配置低效率的一切因素，诸如行为个体之间合作上的摩擦和个体固有的趋利的本性而导致的低效率。

②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高,就越有利于生产资料效能的发挥,这对劳动生产率起着决定性作用。⑤自然条件包括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利用,同样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在马克思的效率观中我们不难发现效率是一个时间观念,它是一个用时间来衡量的单位,没有时间就没有效率,时间的节约就意味着效率的提高,时间的增加就意味着效率的降低。同时,效率是一个劳动成果与劳动时间进行对比的概念,劳动成果就是劳动的产品,根据商品价值的构成^①: $c+v+m$, c 为生产商品或产品消耗的不变资本, v 为生产商品或产品消耗的可变资本。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成本,即生产成本。商品的价值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生产成本,一个是生产利润,因此,劳动者从事生产的劳动效果也就是生产利润,即等于生产成果减去生产成本,形象地说就是生产的收入减去生产的成本。从马克思对生产效率的分析来看,生产效率就是生产效果与生产时间的比率,完全可以定义效率就是效果与取得这些效果所费时间的比率,效果就是达到某一目的所得与所费的差额。如果所得大于所费,我们就称之为有效率,如果所费大于所得,我们就称之为无效率,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②。“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③

马克思的经济学重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以便利用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

① [德]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② [德]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③ [德]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济利益的目的。因此，马克思持的效率观仅仅是揭示经济规律的一种工具和途径，并非真正渗透效率的内涵，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效率仅仅是一种时间的属性和劳动能力的属性，最终是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

（二）西方经济学的效率研究进展

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效率始终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效率分析是微观西方经济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

1. 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于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如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每个人都试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够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是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要好。”^①

在对效率的理解上，更多的经济学家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进行效率分析的，效率问题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新古典经济学更多的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对于效率的解释是很精确的。1906 年，意大利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1896—1897）和《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中，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提出了如下的效率定义：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可行配置，使得组织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在初始时情况一样，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更好，那么这个资源配置是最优的。简单来讲，帕累托效率（或有效配置）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资源的配置状态：一种资源无论如何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而不使另一个人的

^①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23 页。

收入减少；也可以是指一个在最优状态下取得的最大剩余或收入，也就是说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经济发展是高效率的。在随后的 20 世纪上半叶，这一效率的解释被巴罗尼、希克斯和萨缪尔森等接受并发扬光大。帕累托效率概念尽管简单，但是它对 20 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使斯密“看不见的手”概念变得更加明确。

不难看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理论根植于对经济学本身的理解，这种理解以罗宾斯对经济学的理解为代表：经济学是研究稀缺手段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的配置的科学，即“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①，在这种解释背后隐含着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核心思想：即物品和资源是稀缺的；社会必须有效地加以利用。也就是说经济学一直研究的就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这些稀缺资源，并在不同的人中进行分配的问题。在其中，个人的偏好和选择被视为既定数据，而且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对于个人行为的静态理解意味着不存在通过学习或者训练而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提高效率。对于效率的理解也仅限于对资源如何合理配置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显然，新古典视野中资源在既定条件下的配置效率，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并没有涉及经济生活的全部。

2. X（低）效率理论——新古典效率理论的突破

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仅限于静态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并不能为现实经济生活提供较好的衡量标准。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新的效率理论，以 X（低）效率为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效率理论的不足。X（低）效率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②：

① [英] 罗宾斯：《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26 页。

② 根据 [美] 罗杰·弗朗茨著《X 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和刘小怡著《X 效率一般理论》（武汉出版社 1998 年版）整理而成。

萌芽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以莱宾斯坦《消费需求理论中的跟潮、逆潮和凡勃仑效应》发表为标志，这一时期，X（低）效率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了消费过程中消费行为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正是微微理论（micro-micro theory）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

发展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配置效率与 X 效率》、《配置效率、X 效率和福利损失的衡量》、《组织的或摩擦的均衡、X 效率和更新率》等论文陆续发表，其中《配置效率与 X 效率》是 X（低）效率理论的奠基之作，提出了 X（低）效率产生的概念，论述了 X（低）效率的含义和重要性，揭示了 X（低）效率产生的原因，并且分析了 X（低）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者主要是对 X（低）效率的衡量、企业内部运行、通货膨胀和 X（低）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重要问题作了论述；对选择理性、惯性区域等基本概念作了系统的论述。

形成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第一部关于 X（低）效率理论的著作《超越经济人》出版，该书系统论述了 X（低）效率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指出理论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个人，随后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如《X 效率理论、常规企业家和欠发达国家剩余生产能力的产生》、《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正在消失：微微理论》、《X 效率、企业内部行为和增长》，提出了微微理论和微微经济学的概念，从而使 X 理论扩展到经济活动的整个领域，标志着 X（低）效率理论逐渐形成。

完善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莱宾斯坦的另一部代表著作《莱宾斯坦论文集》以及弗朗茨的代表作《X 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先后出版。这些著作开始对 X（低）效率理论进行丰富和完善，并引入心理学、数学知识，发展了选择理性理论和惯性区域理论，同时也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新古典理论通常是假设企业总是在既定的投入和技术状况下实现产出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组织内部的低效

率被该假设的成本最小化给假设掉了^①。在这种背景下，以莱宾斯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展开了基于新古典理论批判的理论框架的构建，他们把组织效率同配置效率分割开来，以个人工作（努力）选择的心理和行为为基础来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的低效率，认为企业组织不仅存在配置效率的问题，而且存在组织（低）效率的问题。这种组织（低）效率便是在本书中提及的 X（低）效率。具体来讲，X（低）效率代表“来源不明的非配置（低）效率”^②，或者说，X（低）效率就是组织由于内部原因而没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或获利机会的一种状态^③，因而又称非配置低效率。莱宾斯坦通过放松最大化行为的假设，并引入惯性、不完全的劳动合同和雇员努力水平的自由选择等要素，认为 X（低）效率的存在便是一个客观事实，它实质上是一种组织或动机低效率。在经济社会中，如何将稀缺的资源分配于不同的组织，使所产生的产品的品质正好满足消费需要，这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而在组织内部如何将稀缺资源转化为最大的产出，这是一个资源利用的问题^④。

X（低）效率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开辟了效率理论研究的新领域——经济组织运行的效率问题。并且开创了将博弈论引入组织内部成员行为研究的先河，提出组织内部员工与雇主之间、员工之间的复杂的博弈行为而导致的不信任和冲突是导致企业内部低效率的重要根源。同时，谢林（Schelling，1960）、拉波波特（Rapoport，1970）、斯科特（Scgitter，1981）、尼尔森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以及萨格登（Sugden，1989）等经济学

① [美] 莱宾斯坦：《微观经济学与 X 效率理论》，费方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4 页。

② [美] 罗杰·弗朗茨：《X 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费方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页。

③ Leibenstein H. 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56.

④ 刘小怡：《X 效率一般理论》，武汉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 页。